

风刀霜剑：清代中后期女性自杀研究^{*}

——以司法档案为中心

杨 康

摘 要 | 不平等的家庭伦理规范、怀疑和污蔑流行的社会氛围、不良的法律，三者共同导致了清代女性群体自杀现象。在家庭中，她们需要面对容隐传统、亲属间的语言、身体冲突和诉讼权利三个方面的不平等伦理压迫。在社会中，贞节成为跨越性别、阶级和种族，动员了家族、邻居、基层政府职员、地方最高长官等全部群体的社会运动，成了影响最广泛和深远的三种群体意识之一。为了维护贞节，妇女要么自杀，要么被心怀疑虑的丈夫乃至奸夫杀死。在法律上，繁琐的律和例详尽规定了妇女自杀的情形。而证据查明的困难、法律打击范围的过度扩张、法律系统内在的混乱、对先前身份的区分，使得自杀成为妇女证明自身清白“最好的”选择。可以说，不良的法律是导致清代妇女自杀的最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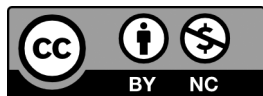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女性；自杀；清代

作者简介 | 杨康，扬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在著名的《葬花吟》中，林黛玉写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令人疑惑的是，她在贾府衣食无忧，“风刀霜剑”指的是什么？这是哀叹还是控诉？熟悉《红楼梦》的读者可以发现，全书从开篇到结尾，没有一个生命出生，反而不断

有女性自杀或去世。如秦可卿、瑞珠、张金哥、鲍二家的、尤二姐、尤三姐、金钏儿。^[1]人口不断死去，却没有新生命的诞生，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件不正常的、可怕的事情。自杀的趋势甚至延续到民国。1935年，阮玲玉自杀，遗书云“人言可畏”。

^{*}本文写作受到2022年5月7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柯岚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线上讲座——《〈红楼梦〉中女性自杀的法社会学分析——以秦可卿之死为例》启发，在此向柯岚教授和主办方表示感谢。

[1] 参见尹伊君：《红楼梦的法律世界》，商务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薛文超：《司法裁判结果责任的古今之辨——以〈红楼梦〉自杀事件的解读为例》，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5期，第146-160页。

在此之前的1919年,长沙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连续发表9篇文章,将其死因归结为“三面铁网”织就的不良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1]民国时期,真正坚固有力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排除帝国主义带来的影响,其家庭构成、社会结构、法律制度与清代有着一定程度的同质性,是清代的延续和残余。可以说,民国妇女自杀的原因与清代妇女自杀的原因大体是相同的。那么,清代妇女自杀如此频繁的原因是什么呢?

英美学者认为,尽管遭遇了某些阻碍,18世纪的女性在普通法和衡平法上获得了更多的领地,在立法和司法上通过实用主义的解释和应用为自己争取有利条件,来保护自己的嫁妆所有权和监护权,更不必说生命权了。英国女性同样“在法律上表现得像个人”(appeared as persons before the law)。^[2]同时,妇女的权益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约翰·穆勒等学者的呼吁下不断增长。那么,同时代中国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络德睦(Teemu Ruskola)认为,由于与道德的联系如此紧密,尽管值得赞美,但清代有关性侵犯的法律只有很少得到执行(unenforced)或不可执行(unenforceable)的道德原则和理念。^[3]然而,果真如此吗?

瞿同祖认识到主奴间奸非的处理,奴婢及其子女属于主人所有,可以任其处分,男主人对奴婢有性的要求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权利。因而,

即便她可以拒奸,但其行为能力和防卫权利较常人是受到主仆的名分和奴仆殴打主人的法律限制的。

“她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不是服从,便是自尽”^[4]可谓十分中肯。但是,他在论述亲属间的奸非情形时,虽然看到由于性的禁忌而带来法律惩罚的严厉,随着血缘的逐渐增强,违法双方不管尊卑需要平等承担责任,^[5]却没有指出,女性的责任在实践中往往比男性更重。也没有指出,这种非法情形常常发生在公公和儿媳之间以及由此导致后者“最好的办法也是自尽”。此外,在讨论“容隐”问题时,他虽然认识到法律禁止亲属间互相告发和作证,子孙如果告发父母、祖父母,将会受到严格制裁。^[6]但是,并没有指出这一规范在女性因奸非而自杀中的作用。赵刘洋认为,清代女性自杀主要是由于滞后于道德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但也没有看到家庭、社会等因素的影响。^[7]因此,讨论清代女性的自杀,不论是法律本身,还是法律之外的家庭与社会,多有未发之覆。

本文搜集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宫中档和军机处档折中有关自杀的案例,经初步统计,共155件,除去重复和没有具体案情的法律建议,剩余134件。其中,数量排在前三名的是官员自杀、妇女自杀和在监犯罪自杀,分别占40.3%、20.9%、19.4%。而在妇女自杀的案例中,因遭受性侵犯或猥亵、侮辱而自杀的又占绝大多数。

表1 清代宫中档案所见自杀者的身份与事由

身份	事由	数量	比例(%)	备注
官、兵	失职畏罪、贫穷、疾病	54	40.3	包括革职和现任及其妻妾
妇女	遭受性侵犯、侮辱、殉亲	28	20.9	案件身份不是尊亲属
在监罪犯	疾病、畏罪、逼迫	26	19.4	

[1] 参见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279页。

[2] Joan R. Gundersen & Gwen Victor Gampel, *Married Women's Legal Status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York and Virginia*, 1982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39, No. 1, pp. 133-134.

[3] Teemu Ruskola, *Law, sexual morality, and gender equality in Qing and Communist China*, 103 *Yale Law Journal*, 1994: 2532.

[4]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4页。

[5] 同上注第59-62页。

[6] 同上注第68、69页。

[7] 赵刘洋:《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家庭——以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妇女自杀为例》,载《天府新论》2016年第5期,第128-133页。

续表

身份	事由	数量	比例（%）	备注
公婆、父母	子女违法犯罪，害怕牵连	10	7.5	案件身份是尊亲属
男性平民	控告官长、遭受性侵犯、畏罪	7	5.2	/
犯罪嫌疑人	盐枭、伪造货币、土匪	6	4.5	/
僧人	买有私盐，畏罪	1	0.7	/
官员	赐死	1	0.7	/
不详	/	1	0.7	/
总计	/	134	100	/

一、家庭在妇女自杀中的作用

吴飞认为，在家庭政治中，要想实现权力的平衡与相互尊重，需要三种元素，即以情感为基础，以过日子为目的，以道德为资本。将三者动态连接的，则是权力游戏。三者中任何一个超过其他二者，都会导致权力失衡，造成悲剧。^[1]清代妇女自杀的情形在法律中主要有以下五种：第一，强占良家妻女；第二，威逼人致死。包括三类，即妻子与人通奸导致公婆自杀，亲属间轻微犯罪自杀，亲属以外的人强奸、调奸、刁奸、图奸、调戏、侮辱、狎亵妇女致其自杀；第三，诬告，包括捏奸诬告、疑奸谈论；第四，子孙违犯教令。妇女通奸导致公婆自杀、被殴打或杀死，或顶撞公婆都会遭到法律严厉惩罚；第五，亲属相奸。可以发现，妇女自杀或导致他人自杀，与非法性行为犯罪存在紧密联系。同男子相比，妇女生活在集体之外，受集体生活的影响较小。^[2]反之，受家庭生活的影响较大。家庭是妇女生活的最主要的场所，绝大多数犯罪是发生在亲属间的，而亲属间尤其是公公与儿媳间的非法性行为又是导致妇女自杀最常见的事件。妇女自杀或被他人杀，在家庭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妇女拥有的道德资本处于绝对的劣势。这从容隐传统、尊卑伦理、诉讼权利三个方面可以看到。

首先，是“容隐”传统。对于受儒家熏陶的司法者来说，尊亲属和家长犯罪，不管多么严重，子孙和奴仆首先应当“容隐”，不应当告官。不管是平民小户还是似海侯门，“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才对。^[3]仆人不应该“穿着青衣抱黑柱”，否则，让主人吃了官司，承担刑事责任，就是“小节不完”。^[4]儒家经典说“中冓之言，不可道也”^[5]；民间俗语说“家丑不可外扬”。在后面的案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出现在当事人的交谈中，也出现在判决书与向皇帝提出的司法建议中。

公公强奸、调奸、图奸儿媳、孙媳，如果未遂，他们会谋杀、故杀儿媳或孙媳；如果既遂，她们会选择自杀。对犯罪的姑息，有时会促使男性尊亲属杀死妇女。胡蟬珠妻子胡彭氏 15 岁，公公胡计锁向其调奸，遭到拒绝，于是不给其饮食，并不时打骂。胡彭氏向丈夫诉说，但后者认为，这是家丑，关于颜面，劝其隐忍。后来，胡计锁再次强奸未遂，于是将其杀死。^[6]果兴德强奸儿媳果周氏未遂，恐怕儿子回家，事情败露，起意灭口。一天夜里，他先是杀死仆人，又来到果周氏房间，果周氏发觉大喊并反抗。果周氏女儿进屋阻止其行为，被其杀死，果周氏受伤逃出。^[7]

[1] 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2] [法]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27页。
[3] 焦大之语，揭露贾府乱伦。见《红楼梦》第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贾蓉也说“胳膊只折在袖子里”。王熙凤因不满贾珍、贾蓉父子擅掇贾琏偷娶尤二姐，撒泼吵闹宁国府。见《红楼梦》第六十八，第827页。
[4] [明] 兰陵笑笑生：《新刻金瓶梅词话》，万历四十五年刊本，第十六册，第19a页。
[5] 《诗经·墙有茨》。
[6] 军机处档折，《奏为申明胡计锁强奸子媳不从将本妇烙伤身死按律定拟由》，宣统二年二月十七日，档号：186180。
[7] 军机处档折，《奏闻审拟佐领果兴德图奸子媳杀毙卑幼家奴案并该犯在监病故由》，道光八年五月初四日，档号：060178。

其次,卑幼对尊长的语言攻击、身体伤害都会遭到法律的严厉打击。清代,骂兄、姐,笞五十;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绞。即便骂前夫的祖父母、父母,依然是绞。^[1]徐老才48岁,其母74岁。一天,徐老才工作回家,催促母亲做饭。其母发脾气,被儿子骂道“作死”,于是跳水塘自尽。徐老才害怕水深,不敢跳水,回家叫人。“悖逆伦纪,大干不法”。先是照威逼致死律拟斩决,后比照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律拟凌迟。^[2]

如果使丈夫的父母、祖父母受到身体伤害,惩罚会更加严厉。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斩;杀者,凌迟处死;过失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反之,夫之祖父母、父母由于子孙违犯教令而殴杀,依法决罚、邂逅致死的,勿论。^[3]同时,法律规定,奸子孙之妇,各斩决。^[4]这就极大压缩了妇女的生存空间。面对公公的强奸,儿媳如果接受,她将面临斩刑;如果不接受而防卫,她很难不伤害对方。而一旦造成对方受伤害,即便是轻伤,便面临绞、斩,乃至凌迟的处罚。除非其行为确实是出于防卫强奸目的,且有公公本人或者邻居或者同屋之人证明,才会比照此前的一个判例,无罪。^[5]但如果造成对方重伤或死亡,也不过是改为斩监或绞监。^[6]徐二醉酒后回家,将儿媳刘氏推按炕沿,强欲奸污。刘氏顺手拿起木块,将徐二殴伤。徐二仍不放弃,从后面拉住刘氏衣襟,声称总欲成奸。刘氏将其抵

推倒地,失足跌震,受内伤死亡。刘氏凌迟处死,候旨定夺。^[7]赵氏被公公按压在床,裤子被撕破,情急之下取铁锥将其扎伤,按照妻殴夫之父律,斩立决。^[8]广善想要强奸儿媳佟吕氏,佟吕氏大喊,广善把舌头放进她的口中阻止其叫喊,却被咬掉舌尖。广善的弟弟存善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希望事情平息。佟吕氏害怕会判重罪,哭泣不止。存善于是劝广善写立字据,日后生死不与儿媳相干。佟吕氏照殴夫之父律,斩立决,请旨定夺。广善照强奸子妇未成例发边远充军。存善例得容隐,无罪。^[9]

由于对尊卑名分的极端重视,翁媳通奸可能导致一个家庭瞬间破碎。葛超群与儿媳葛萧氏通奸,儿子葛德宇误以为父亲为窃贼,将其殴死。族人认为翁媳通奸,“报官有关合族颜面”,于是移尸嫁祸他人。葛萧氏照“奸子孙之妇,奸夫、奸妇各斩”律斩立决,葛德宇照子孙过失杀父母例绞立决。葛张氏与葛德宇属于母子关系,律得容隐,毋庸议。^[10]

最后,起诉丈夫及丈夫的直系尊亲属严重违反伦理规范,迫使妇女自杀。如果起诉内容真实,她们要因为“干名犯义”而杖一百、徒三年;如果不真实,她们要因为“诬执翁奸”而处斩。^[11]由于证据收集的困难,事实难以查明,那么,按照海瑞“与其屈兄,宁如屈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的逻辑,^[12]也会推衍出“与其屈翁姑,宁屈子妇”的价值判断,妇女大概率会被判处斩刑。

[1] 马建石、杨育棠:《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6-867页。

[2] 《奏为拟将威逼其母忿激投塘之缙云县民徐老才凌迟处死折》,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档号:403016177。

[3] 马建石、杨育棠:《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56页。

[4] 同上注第956页。

[5] 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499页。

[6] 《奏为申明辽阳州犯妇王氏因拒奸起衅砍伤亲翁王满信按律定拟恭陈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档号:408005193。

[7] 《奏报审办子妇拒奸致斃翁命案》,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档号:405006032。

[8] 《奏为申明光山县民张万言强奸子妇未成致被拒伤及被赵学周等殴伤身死一案恭折奏闻》,嘉庆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档号:404014404。

[9] 军机处档折,《奏报审拟佟吕氏因拒奸而咬落伊翁广善舌尖一案》,道光七年十月十九日,档号:057202。

[10] 《奏为审拟伦纪重案零都县民葛超群与子媳葛萧氏通奸案并讯明原问官错误缘由恭折覆奏》,嘉庆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档号:404005701。

[11] 马建石、杨育棠:《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2、958页。

[12] [明]海瑞:《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页。

都是一死，与其死于胥吏之手，不如自行了断。弓兵向凝教唆姚氏诬告公公调戏未遂，姚氏照诬告亲翁律，绞决。^[1]张氏被翁姑责打受苦，其母亲张崔氏教唆她诬告公公彭三强奸，照诬执翁奸律，拟流。^[2]豫亲王裕兴强奸使女寅格已成，致其羞忿自尽。由于寅格是下包衣世禄之女，裕兴照强奸已成，本妇自尽斩候律减一等，拟流。世禄照奴婢告家长得实律，徒三年。^[3]杨有图奸雇工人曹三之妻赤氏，致其羞忿自尽。刑部认为，曹三夫妇是杨有父亲曹文明的雇工，曹文明有家长的名分，家长强奸子妇未成而妇女自尽，最高只需判处充军，因为“尊卑统属，不得概以常例”。^[4]一语道破伦理的不平等。

此外，如果说，来自已婚妇女夫家的等级伦理是导致其自杀的一个力量，那么，来自母家的力量则是另一个力量，缓和了其在夫家的屈辱感，提供了死后由母家为自己复仇的快感。西门大姐遭到陈经济打骂，上吊死了，她的母亲和舅舅便到陈经济家把门窗都打烂，把陪嫁的箱笼都搬了回去。^[5]民国，妇女因为家庭不睦而自杀，她的父母和兄弟将要求赔偿，甚至把丈夫的房屋部分拆毁。^[6]

二、社会在妇女自杀中的作用

Derke Bodde 和 Clarence Morris 认为，《刑案汇览》由于着眼于法律条文而隐没了具有重大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的事实。^[7]这句话是正确的。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其他资料，如会典记载的皇帝谕令、司法官员的个人记述、进呈给皇帝的奏折，部

分地还原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心理。

首先应当明确，除了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引起的自杀，绝大多数的自杀属于群体现象。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认为，共同意识而非其他的事物决定了群体的存在与分界。在群体中，群体的共性取代了个体的个性，同质性取代了异质性。个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商，但在形成族群、种群和群体后，这些都被吞噬了，有意识的人格、意志和辨别力消失了，无意识因素取而代之。人们在某种暗示下，会产生难以抵抗的冲动，使自己完全不顾后果地采取某种同样的举动。^[8]

而更准确地说，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埃米尔·迪尔凯姆断言，“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具有一定能量的集体力量推动人们去自杀”^[9]。自杀是一种道德行为，而道德只有在社会中才有。因此，自杀本质上是社会现象。自杀看似表现的是个人的性格，实际上是某种社会状态的继续和延伸。社会的气质、民族的气质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只要社会不变，道德规范不变，自杀的人数也就保持不变。^[10]

吴飞从中国特有的“面子”文化解读中国的自杀问题。自杀是正常人的特权，因为自杀包含对人格价值的追求。当人格，也就是在社会中的面子受损，人们就通过自杀来实现对人格的积极维护。^[11]家庭是人际关系的根源，在面子的塑造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2]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在面子的塑造中同样具有巨大作用。在集体主义长期高度盛行的国家，尤其如此。当社会剥夺了一个人的面子，而家庭又站在社会一边，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面子被彻底剥夺。

[1] [清]祝庆祺、鲍书芸、何维楷编：《刑案汇览》，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5页。

[2] 同上注第1803页。

[3] 同上注第2001页。

[4] 同上注第2003页。

[5]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万历四十五年刊本，第十九册，第12b页。

[6]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7] [美]D. 布迪、C. 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8]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张倩倩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6页。

[9]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27页。

[10] 参见上注第328-353页。

[11] 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208-209页。

[12] 同上注第209页。

那么,导致清代妇女自杀的社会道德规范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贞节观。Vivien·W·Ng认为,清代之所以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贞节,是因为这是清朝统治者复兴儒学——也就是恢复和扶持明朝中后期被王阳明心学盖住风头的程朱理学——的努力的重要部分,以此感召保守的(坚持“种族夷狄观”而非“文化夷狄观”)学者拥护新的统治者。^[1]几乎与满人入关同时,从顺治三年开始,旌表节妇就成为了一项上自满蒙宗室贵族、下至编户平民,跨越种族、阶级、性别,兼具物质与荣誉表彰,与“忠”和“孝”三足鼎立的最重要的社会规范和集体意识。^[2]康熙六年细化了“节妇”的国家标准。民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节,至五十岁以后完全节操者,题请照例旌表。十一年又制定了“烈妇”的标准和待遇。强奸不从以致身死之烈妇,照节妇例旌表,地方官给银三十两,本家建坊。^[3]当然,虽然贞节政治^[4]是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但是如果说毫无妇女的自主意识和自主选择,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只不过,国家把少数人的选择塑造成了所有人都应遵守的“理”,即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

在国家的主导下,“贞节”成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运动,渗透于社会、政治和司法的每一个角落。乾隆十四年谕令,“嗣后举报节孝,请令直省督抚训示地方有司实心体访,咨于学校,询于舆论”,尤其要注意到“荒村僻壤,孤苦单寒”。如果有遗

漏,家族、邻居、胥役乃至督抚都要受到处分。^[5]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全面支持,妇女自杀成为一种十分强烈的社会风潮,“闻阖激烈之风,愚民轻生之习”。^[6]虽然几位皇帝屡次谕令减弱此种风习,但始终无法根本扭转集体无意识。甚至出现了妇女本来不愿自杀,而亲人为了“家族荣誉”逼迫其自杀的现象。很显然,相比于十年寒窗却不一定能够金榜题名的科举,通过自杀来“光宗耀祖”的确“容易”许多。俞正燮悲痛愤慨地谈到,福建地区,男性为了家族的面面强迫妇女给丈夫殉葬。“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7]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河南巡抚何焯上奏,在有些图奸案件中,男性不惜杀死失身的妻子却将其伪装成自杀。例如,乾隆二十八年,张成妻子常氏被人调戏,于是逼妻子自尽。常氏不肯动手,张成夺刀将其杀死。乾隆三十年,冀三群妻子赵氏被人图奸,冀三群逼迫妻子拼命,妻子不从,于是将其扎死。^[8]何焯认为,应当区别妇女自尽的具体情形,给予树立牌坊、刻石姓名、匾额嘉奖等不同程度的奖励。乾隆皇帝否决了他的意见。认为妇女只要羞忿自杀,就应当“建坊入祠”,以此“维持风化”。虽然有妇女“本不欲死,而夫与父母相逼而成者”的情况,但如果区分情形立法,就不利于给予真正自杀的妇女应有的荣誉,“岂善善欲长之意?”^[9]

按照埃米尔·迪尔凯姆对自杀的三种分类,即利己型、利他型和反常型,^[10]清代妇女因维护贞

[1] Vivien W Ng, *Ideology and Sexuality: Rape Laws in Qing China*, 1987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6, No. 1, pp. 58-59.

[2] [清]张廷玉等纂:《大清会典则例·礼部·风教》卷七十一,乾隆内务府刻本,第1b页。

[3] 同上注第6b-7a页。

[4] 参见费丝言:《丑事:盛清的贞节政治》,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6年第14期,第255-271页。

[5] [清]张廷玉等纂:《大清会典则例·礼部·风教》卷七十一,乾隆内务府刻本,第20a-21a页。

[6] 同上注第16a页。

[7]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清]俞正燮:《癸巳类稿·贞女说》,涂小马等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页。

[8] 《奏为对于妇女因强奸自尽或因言语调戏羞忿自尽者予以旌表建坊事敬陈愚昧之见仰祈圣鉴》,乾隆三十年九月初十,档号:403021380。

[9] 《奏为妇女因调奸羞忿自尽案情不一将旌表之处分别核定自当遵照何焯所奏情节一体钦遵办理》,乾隆30年10月13日,档号:403021607。

[10] 参见[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9、232、258-302页。

节而自杀无疑是属于利他主义的。在国家看来，旌表节义是“朝廷风化所关”，是“彰善大典”，可以“使民有所观感”。^[1]之所以自杀，不是因为她们自以为有“自杀的权利”，而是因为它们有“自杀的义务”，为了社会目的而牺牲。在追随者和主人之间存在密切的依赖关系，排除任何分离的念头。她们必须追随其主人，哪怕到坟墓里去。^[2]

总之，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是邻居、亲戚还是自己，统治者“使民有所观感”的目标实现了，一个在时间上、空间上和影响人民生活的程度上前所未有的集体无意识诞生了。重视贞节，是所有阶级共享的第一种群体意识。而为了维护贞节，最好乃至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则是第二种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普遍对丧失贞节在法律上的后果有基本了解。^[3]遭受性侵犯与性骚扰的被害人“不只遭受到陌生人的谴责，就连那些她们认识的人们，尤其经常是自己的邻居或亲戚，也都一致地责难她们”^[4]。而当事妇女本人为维护贞节而自杀，往往也出于获得国家荣誉的目的。在一个案件中，妇女在遭到语言猥亵后第28天自尽。汪辉祖虽然判决出秽语者杖一百，徒三年，却没有为自尽妇女请旌，她于是托梦汪辉祖，说在阴间控告他不给自己请旌。^[5]

在农村较为封闭和停滞的环境下，国家政策和法律逐渐与道德、舆论融为一体，掌握着无形

但强大的话语权。只需经过这一“看不见的法官”的审判，妇女就会自动投缳赴水。有遭到污蔑而自尽的。胡大福外出就医，母亲胡樵氏和妻子胡李氏在家。因修理房屋，家中没有男丁，胡樵氏让亲戚杨德金来家里照料。殷恒旺等人经过，起意诬奸讹诈，得赃分用。他们在外屋扭住杨德金，称其与胡李氏有奸，讹诈30元。杨德金只有2元，剩余28元立期画押。胡李氏被诬，气忿莫释，吞洋烟自杀。^[6]茹应韶看见陈海子从茹封印家走出，问他事由，却不回答。因而怀疑其与茹封印妻子雷氏有奸，嘱咐茹封印留心察看。雷氏听说后，忿激自缢。^[7]有怀疑自己遭到污蔑而自尽的。杨杰向杨治家之妻刘氏调奸，刘氏不依，杨杰逃走。杨治家向杨杰之母张氏告知，张氏说等儿子回家让他去赔礼。杨治家回家劝慰，刘氏消气。十天后，张家猫走失，于是以“谁家妇女将猫霸住不放”之言在街海骂。刘氏闻知，怀疑其借端污蔑，抱忿哭泣，服毒自尽。^[8]刘耀向祁纪氏之翁斂钱要灯，纪氏答称伊翁回家再给。刘耀急需用钱，骂道同其睡觉就不要钱了。纪氏回母家哭诉，母亲安慰后将其送回。刘耀不知纪氏已经回家，在她家墙外水井打水，随口唱秧歌。纪氏怀疑其有意讥消，自缢身死。^[9]此外，背地谈论、背地戏谑、丈夫的怀疑、邻居夫妻间的嘲讽、胳膊被人触碰等，^[10]都会成为妇女自杀的理由，就连知县也会被扣上

[1] [清]张廷玉等纂：《大清会典则例·礼部·风教》卷七十一，乾隆内务府刻本，第20a、8b、9b页。

[2]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32-233页。

[3] 《金瓶梅》里写叔嫂通奸被邻居窥破，拴到大街上去。一个老者了解情况后，说道，“可伤。原来小叔儿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奸，两个都是绞罪。”但是，旁人知道他的三个儿媳，都遭到他的性侵犯。因而反问，“你老人家深通条律。像这小叔养嫂子的，便是绞罪。若是公公养媳妇的，却论甚么罪？”“那老者见不是话，低着头，一声儿没言语走了。”[明]兰陵笑笑生：《新刻金瓶梅词话》，明万历四十五年刊本，第七册，第11a-b页。

[4] Janet Theiss, *Disgraceful matters: the politics of chas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56. 转引自步德茂(Thomas Buoye):《18世纪山东的杀害亲人事件：贫穷、绝望与讼案审理中的政治操作》，载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页。

[5] [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上，清道光二十年龚裕刻本，第20b-21b页。

[6] 《奏为诬奸讹诈酿命人犯按例定拟并附请旌表折》，光绪朝，档号：408018806。

[7] [清]祝庆祺、鲍书芸、何维楷编：《刑案汇览》，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3页。

[8] 同上注第1290页。

[9] 同上注第1302页。

[10] 同上注第1302-1307页。

污蔑妇女致其自尽的罪名。^[1]

伴随对贞节的强调,怀疑、污蔑成为四处游荡的幽灵,被怀疑的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遭到故意杀害。由于性犯罪在底层贫穷人民中间很常见,^[2]这种可能性也就比较大。镇营哨长欧有科妻子欧黄氏在院里洗衣服,差弁刘洪毅走来询问昨日其与丈夫吵架的情由。欧有科怀疑二人有奸,因此夜里来到刘洪毅的住处,将其杀死。^[3]步兵雍喜的妻子杨氏笨拙丑陋,从未与人戏笑。同营步兵朱希开玩笑说与其妻子相好。雍喜向长官控诉,不仅没有得到查明,反而两次遭到杖责。因而气忿,杀死妻子。^[4]像这样因为怀疑妻子与他人有奸,将其杀死的案件,并不鲜见。^[5]甚至有怀疑情妇不忠而将其杀死的。李伏金与丁保之妻董氏调戏成奸。后丁保搬家,董氏拒绝与李伏金持续非法关系。李伏金怀疑其另与他人相好,将其杀害。^[6]

在现代农村,舆论等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在一个村子里,人们的生活范围有限,无论是去村庄之内的田野劳动,还是离开村庄赶集、走亲戚、上班,都会和邻居产生交集,更不必说需要整个宗族参与的婚丧大事。假使两个人——通常是一个族里的人,也就是所谓本家——因为某一件小事发生争执而没有得到解决,在一般情形下他们会失去交流的意愿,却会向各自信任或相好的熟人倾诉,让他们“评评理”。多半情况下,他(她)的意见会通过这一中间人传到对方那里。在这期间,他们不会有沟

通和交往。但是,子女结婚或家中老人去世的情况总会发生,在这些场合下,矛盾的另一方必须出场,否则就要冒“老死不相往来”的“断网”风险。也就是说,在以后的生活中,彼此的关系网不再相交,彼此从各自的“关系网”中脱离出去。但是,这一风险的代价非常高昂。这意味着,怨恨在农事、工作、吃饭乃至睡觉时都伴随着他们,成为心头沉重的负担,从而降低生活质量。在古代,村庄是前城市化时代一个男性“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的场所,是成年女性仅次于家庭的、从出嫁至死亡所生活的场所。如此,舆论等社会规范的力量怎能不强大呢?

三、法律在妇女自杀中的作用

吴飞认为,要解决自杀问题,尤其是自杀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问题,最终需要依靠国家和法律的力量。^[7]尽管这句话是针对现代自杀问题的解决而言的,对于理解清代妇女自杀的原因也是非常恰当的。

清代有关妇女自杀的律例比较分散,见于强占良家妻女、诬告、子孙违犯教令、犯奸,包括亲属相奸、奴及雇工人奸家长妻、威逼人致死等条目下。并且,存在大量法条竞合的情形。例如,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妇女因为性犯罪而自杀的法律规定,那么必须同时查阅有关犯奸的法律和有关威逼人致死的法律,才能得到较为完整的认识。清代律的规定比较简单: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包括他杀与自杀),杖一百;官吏、公使非因公事威逼致平民死者,

[1] 军机处档折,《奏为鲁山县知县荣誉被控污蔑妇女酿命请先行解任以凭质审具奏》,道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档号:055197。

[2] 赖惠敏:《情欲与刑罚:清前期犯奸案件的历史解读(1644—1795)》,载《中西法律传统》2008年,第378—424页。

[3] 《奏为审明镇营哨长因疑奸谋杀差弁身死按律定拟恭折具陈》,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档号:408008816。

[4] 《奏为被部驳之伊犁巴燕岱营步兵雍喜疑奸气忿杀妻一案兹将覆讯缘由具奏乞示》,嘉庆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档号:404010897。

[5] 《奏为回子玉奴思疑奸故杀妻死审明定拟事》,咸丰五年九月初七,档号:406006676;《奏报回子疑奸殴伤命案审明按律定拟情形》,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档号:406000355。

[6] 《为疑奸妒杀命案审明照例办理恭折奏闻》,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档号:404017009。类似案件还有《奏闻审明英吉沙尔听缠回托乎大疑奸起衅斗杀人命案定拟缘由》,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七日,档号:408006684。

[7] 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

罪同；卑幼威逼其亲尊长致死者，绞监候，大功以下递减；因奸盗威逼人致死，斩监候；奸、盗不论既遂与未遂。但是，条例的规定非常复杂、繁琐，共 25 条。除了与性犯罪无关条文，还包括奸夫将奸妇及其公婆杀死、公婆因此类丑事而羞愧自杀，当然最多的条文是女性因为既遂或未遂的非法性关系或者非法怀孕而堕胎死亡，以及言语侮辱而自杀，共 13 条，超过了一半。^[1]

有些严重犯罪，妇女的自尽反应和对罪犯的处罚与现代比较接近。如轮奸良人妇女致其自尽，为首者，斩立决；为从同奸者，绞立决；未同奸者，发回城给伯克回子为奴。^[2]陈世林因吸食洋烟致贫，与妻子陈澹氏乞讨为生，在一处社公庙里居住。陈世林每日进城乞讨，傍晚回归。一日，龚汰立起意轮奸，蔡添幅、吴许寄允从。三人来到庙里，将陈澹氏按住，龚汰立首先强奸，吴许寄随后，蔡添幅畏惧退缩。陈澹氏羞忿莫释，吞食洋烟自尽。龚汰立斩立决，蔡添幅发云贵两广极边充军。吴许寄在逃。^[3]

但是，清代很多关于妇女自杀的法律和案件处理都与现代语境具有极大差异。例如，与他人和奸，奸妇因奸情败露而自尽，奸夫杖一百、徒三年。李罗氏长女去世，次女李姐儿与姐夫尚淳调戏成奸，后怀孕。因李罗氏长期外出，尚淳遂向李罗氏的小叔李路央告求婚。李路代替姐姐作主，与尚淳叔叔互换庚帖。后来，尚淳的叔叔听说李罗氏已经将李姐儿许配他人，且已经换了

庚帖，于是将自己手中的庚帖退回。李姐儿向母亲撒谎自己被尚淳诱奸，李罗氏非常生气，尚淳却躲了起来。当日傍晚，李姐儿自尽。尚淳杖一百、徒三年。^[4]

因为别的事情与妇女口角辱骂，妇女听到脏话而气忿轻生的，杖一百、流三千里。杨毛氏是杨镇烈堂嫂，与黄玉凤家土地相连。黄玉凤去田里收获芥子，因为口渴，顺手摘取杨家园地里花红（一种华北常见水果）。杨镇烈发现后，训斥她“口馋好吃，不如为娼”。后来，黄玉凤路过茶馆，认为杨镇烈不应骂她，并讥讽其母亲再醮。杨镇烈斥骂她偷花养汉。黄氏气愤，去找杨毛氏哭诉。刚好听到邻居吵架，一方说另一方不应年轻撒泼。黄氏随即向杨毛氏争吵。杨毛氏气忿，说她如此心虚，可能真的养汉。黄氏哭泣回家，母亲安慰无果，服烟土自尽。依照威逼人致死例，杨镇烈杖一百、流三千里。杨毛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收赎。黄氏请旌。^[5]

妇女仅仅因为亵语戏谑，羞忿自尽的，比照调戏例，绞监。^[6]相二犬从集上饮酒回来，经过葛开福家，进去闲游。葛张氏在院里纳凉。相二犬见其貌美，因而调戏。葛张氏不依叫骂。邻居与葛开福将其拦住喝问，葛张氏追骂。相二犬逃出门外，捏造说她约自己去睡。葛氏夫妇赶出，相二犬逃跑。葛张氏经葛开福劝慰无果，吞洋烟自尽。总督认为，虽然相二犬没有挟制窘辱等严重情节，不适用因奸威逼人致死律，但是因调奸起衅，应当照调戏处理，

[1] 清代的律文虽然很早就定了下来，并且成为不刊之典。但乾隆时期，条例五年小修，十年大修，成为定制。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76页。马建石、杨育棠所著《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依据的是吴坛所著《大清律例通考》，对律例的考释止于乾隆四十三年；而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的《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依据的底本是道光六年版。前者共18条例，后者共25条例，多出7条，且单独的例文中也有增改。本文主要依据张著。另据薛允升统计，该律有关奸情的条例共17条。[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三十四，清光绪刊本，73b。

[2] 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555页。

[3] 军机处档折，《奏因德化棍徒轮奸良妇羞忿自尽获犯审明定拟》，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档号：146549。

[4] 《奏为遵旨审明尚淳与李姐儿通奸怀孕羞愧自尽一案按律定拟奏祈圣鉴》，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档号：405001698。

[5] 《奏为民间杨镇烈秽语詈骂黄玉凤致令羞忿自尽按例定拟附请旌表恭奏》，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档号：408007133。类似案件还有，军机处档折《奏报徐潘氏闻秽语气忿自尽请旨旌奖》，宣统十年八月初一日，档号：180495。

[6] 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绞监。葛张氏请旌。^[1]

妇女被人调奸未成,已经和解平息,后来由于被人耻笑,追悔报忿自尽的,杖一百、流三千里。^[2]夏印漳丈人张前家娶媳,夏印漳前往帮忙。夜里,张前因觉寒冷,让夏印漳到屋里拿衣服。夏印漳进去后,看见张刘氏独卧在床,起意图奸,揭被摸索。张刘氏惊觉喊嚷,夏印漳畏懼逸出。张刘氏吞服鸦片烟自尽。夏印漳杖一百、流三千里。^[3]

还有一些因为强占良家妻女或私奔未遂而自杀的案件。卢永安与母亲和妹妹卢小会哥在亲戚家避难,富长悦为节省聘礼,伙同多人将其强抢给儿子富成申作媳妇。带到富成申姐丈家中,告诉她说择日成亲,并未奸污。卢小会哥哭闹不依,夜里趁机投井自尽。富成申依照聚众伙谋,于素无瓜葛之家,入室抢夺妇女,为从者,绞监例,绞监;卢小会哥请旌。^[4]还有,容城县王虎儿在崔彬弟弟家佣工,与崔彬之女崔贵荣调戏成奸。后崔彬将房间出租他人,借邻居李栓儿的房子给王虎儿住。两人持续保持非法性关系。被李栓儿的妻子李李氏发觉后,恳求隐瞒。崔贵荣担心奸情败露,来到李家,计划与王虎儿私奔。王虎儿回家,被母亲得知,遭到训斥,于是请求哥哥王山儿代替他与崔贵荣逃跑。夜里,崔贵荣翻墙逃出,与王山儿到李李氏家暂时躲避。王山儿到朋友家里寄存行李,打算第二天再去领回崔贵荣。李李氏劝告崔贵荣不必逃跑,并说次日送她回家。崔贵荣愧悔哭泣,声称不该作丑事,无颜见人,趁机投井自尽。王虎儿依照和诱知情之人,为首者,拟军律发四千里充军、刺字、杖一百。王

山儿依照和诱律家人助势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崔贵荣满徒,身死勿论。^[5]

由于司法实践在妇女自杀案件中的结果主义惯性,一些即便妇女不占理的案件,司法者也倾向于判处对方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表彰妇女贞洁的法律产生了“溢出效应”,即便轻微侵犯妇女性权利以外的人格尊严,妇女自杀的结果和侵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很微弱,侵害者也会受到惩罚。例如,寡妇纪杨氏典卖房屋,因买方没有现银,傅根豫代出五十两银票。交房在先,交钱在后。后买卖双方发生争执,房子尚未过户,县衙判令双方退还银契。纪杨氏到傅根豫的油行赊油,傅根豫不从,纪杨氏争闹,傅根豫让雇工田二将其看守,自己到县衙控诉。田二擅自将纪杨氏捆绑,致其气忿莫释,六天后服毒自杀。傅根豫依威逼人致死律杖一百。田二倚恃权势,纪杨氏自尽虽非其意料所及,擅自捆绑,究属不合,照不应重律杖八十。^[6]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性犯罪中,并非只有妇女群体中才自杀。当女性亲属做了不名誉的丑事,也会侵犯到男性的人格尊严。黄氏与何城樟通奸,其夫黄炳萌回归,进屋喊骂。何城樟情急,夺棒殴打黄炳萌逃走。黄炳萌羞忿莫释,吞洋烟自尽。黄氏依照妇女与人通奸,并未纵容之夫,一经见闻,杀奸不遂,羞忿自尽例,绞监;何城樟杖一百,徒三年。^[7]还有,罗自贵弟妇罗徐氏与旗人杨安通奸。后家人发现,去杨安家质问。罗自贵与母亲遭到杨安殴打。罗家控诉,受到传押。旗兵巴哈布见罗徐氏貌美,逼奸欺辱。罗自贵认为难以见人,因而自

[1] 《奏为申明调奸未成致本妇羞忿自尽人犯海州相二犬按例定拟恭折奏闻》,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档号:408002040。类似案件还有《奏为舞阳县申明调奸无服族侄女不从致令羞忿自尽案犯阚川照例定拟恭陈事》,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一日,档号:408010388。

[2] 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470页。

[3] 军机处档折《事由奏为申明灵丘县民夏印漳调奸未成本妇刘氏羞忿自尽请旌》,光绪三十年七月三十日,档号:162615。

[4] 《奏为申明听从强抢妇女已成致被抢之人羞忿自尽人犯富成申按例定拟恭奏》,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档号:408005033。

[5] 《奏为京控命案审系因奸同逃愧悔自尽按例分别定拟》,道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档号:405002845。

[6] 军机处档折,《奏为查覆盱眙县节妇纪杨氏被逼自尽案由》,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档号:152073。

[7] 军机处档折,《法部咨呈军机处事为川省审拟因奸致本夫羞忿自尽一案依律定拟奉旨依议》,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档号:170339。

缢。巴哈布依因奸威逼人致死律绞监。杨安照凶恶棍徒无故扰害良人例发四千里充军。罗徐氏照军民相奸例枷号一个月，杖一百。^[1]

总之，清代法律有以下四个原因诱使或引发妇女自杀。第一，证据查明的困难。强奸的成立条件十分苛刻。强奸在内涵上是“强暴之状，妇人不能挣脱之情”，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有人闻知、须损伤肤体、毁裂衣服”。^[2]以此为基础，区分和奸、调奸、刁奸等名目。然而，在电子信息技术十分发达的现代，视听保存、生物化验技术得到较大范围的推广，强奸案件的审理尚有困难，遑论清代。袁滨在《律例条辨》里指出，性犯罪审理在案件事实调查阶段就面临着重大困难，难以区分强奸与和奸。如果说“裂衣损肤及有人闻知”可以证明犯罪的初始状态为“强奸”。但是“衣破复完，肤创仍复”可以证明犯罪的完成状态为“和奸”吗？受害者认为犯罪的完成状态为“强奸”，强奸者认为完成状态为“和奸”，那么，听谁的？就证人方面而言，法律规定，和奸的证据是“叫呼渐轻，四邻无闻”。但是在实践中，如果邻居果真可以听到呼喊，那么“奸且不成，而强于何有？”况且，“又孰辨其声之始终乎？又谁质证之以陷人于死地乎？”有谁会见证完整的过程呢？即便见证了，有谁会冒着被报复的危险呢？更何况，强奸者大多是利用被害人“华门蓬户，四邻无闻”的环境犯罪的，这就连证人也沒有了。“事属暧昧，讯者茫然”，必将导致“法庭以自尽者为强，不自尽者为和”，从而变相地鼓励妇女自杀。^[3]

第二，法律打击范围过度扩张，把和奸、调戏、侮辱等轻微犯罪或根本不是犯罪的情形都规定为引起妇女自杀的原因。法律规定，调奸未遂，妇女羞忿自尽，拟绞。这是因为“事关风教，无可宽弛”。但是，调奸是和奸的未完成形态，或者预备形态，

与之没有本质差别，不当处以杖刑，更不应处以绞刑。“调者，和之未成也；其调者，和在意中。其自尽者，变生意外。其意内之杖，尚在难加；其意外之绞，忽然已至，诚可哀怜。”这就导致了两个不良社会后果。首先，强奸未遂，法律只判处杖或流；而调奸未遂，却要处以死刑，这就迫使犯罪者在两者中选择强奸了，“彼毒淫者又何所择轻重而不强乎？”其次，与为丈夫殉葬的烈妇相比，调奸自尽在社会意义上是逊色的，如果一概给予旌表，并且判处调奸者死刑，“不教天下之女子以轻生乎？”正确的做法是，妇女因辱骂或调戏而自尽，因果关系过于微弱，只要处罚基础行为就可以了。^[4]

薛允升认为，妇女因为奸情败露而自杀的法律责任最终应当由自身来承担，才是正当的。“系属孽由自作，于人无尤”^[5]。沈家本也认为，由于很多情况下妇女自杀与男性侵害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法律就不应让后者承担法律责任。否则，法律就是不正义的。而清代法律正是这样。妇女“强暴猝膺，受辱无颜，捐躯明志，则胁迫之罪，自无可宽。”但是，如果只是“手足勾挑，语言调戏”，不过是一定程度的猥亵，与妇女的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甚至“村野愚民，戏谑村辱，种种情节，一入妇女之耳，遽尔轻生”，不仅没有强迫，也没有猥亵，“以此抵死，乌得为平？”^[6]很少情况下，对于与妇女自杀有直接关系的人，司法者处以较轻的刑罚。例如，王贵女儿王勤姐守寡六年，后未经父母同意而仅由翁姑托人说媒，许给马潮青。王勤姐在厨房洗锅，不慎打破，被马潮青呵斥，轻生自缢。在这一案件中，由于司法者对其抢婚行为是支持、认可的，妇女的自杀与奸事基本没有联系，才判定王勤姐是自寻短见。虽然对马潮青作了处罚，但是其罪名并非威逼人致死，也非强占良家妻女，

[1] 军机处档折，《奏报会同申明旗员违例传押妇女以致兵丁威逼成奸本妇属自尽按律分别定拟》，道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档号：065282。

[2] 马建石、杨育棠：《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0页。

[3] [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二十六，民国徐氏退耕堂刊本，14b-15a。

[4] [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三十四，清光绪刊本，64b-65b。沈家本同样引用这段评论。见沈家本：《寄谕文存》，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4页。

[5] [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三十四，清光绪刊本，72a。

[6] [清]沈家本：《寄谕文存》，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7页。

而是明知有纠葛却冒昧娶妻。但法律上并无明确罪名,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枷号一个月。^[1]

第三,内在的混乱,即罪责刑不相适应,重罪轻罚、轻罪重罚,使法律失去了指引功能。清代法律为了追求量刑的精确性,几乎一事一例。不仅丢失了简洁性、系统性,而且导致大量冲突与混乱,甚至违背自身追求的原则。薛允升总结道,唐代没有威逼人致死的法律,只按照基础行为进行裁判。明代虽然制定威逼人致死的法律,但大多数仅徒三年,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只是充军而已。清代却规定了名目繁琐的条例。“如刁徒、假差、蠹役,及和奸、调奸、强奸、轮奸等类致令自尽,并其亲属自尽者,不一而足。秋审且有人于情实者。较之亲手杀人之案,办理转严。不特刑章日烦,亦与律意不符矣。究而言之,律文未尽妥协,故例文亦诸多纷歧也”^[2]。譬如,和奸致本妇自尽,拟徒。因奸致二人死亡,仍拟徒,未免太宽。本夫杀死奸妇,宽本夫而严奸夫;致使本夫羞忿自尽,却宽奸夫而严奸妇。调奸妇女未遂,致其夫与父母、亲属自尽,拟绞候;和奸既遂,夫与父母自尽,反拟徒。^[3]又如,因事与妇人口角秽语村辱,致使妇女自尽,丈夫又自尽,绞监。与侮辱相比,调奸对妇女权利的侵害更大,但是调奸仅判处充军,侮辱却判处绞监。^[4]有些条例的制定也违背了准五服治罪的基本原则。例如,强奸妻子前夫之女未遂,致使妻子自尽,那么,丈夫应当斩候吗?或者强奸儿子或侄子的妻子未遂,而他们自尽,那么父亲或叔叔也要斩候吗?^[5]这与家族主义和儒家伦理明显冲突。

第四,对先前身份的区分,也就是对贞洁的强调,迫使妇女自杀。清代根据被害妇女的先前身份是“良人妇女”还是“犯奸妇女”,决定保护力度的大小,对前者的保护力度大于后者。这种区别对待或歧视(discrimination)和法律偏见(prejudice)也迫使妇女在第一次失身后自杀。法律规定,强奸

已经犯奸妇女既遂,致使其羞愧自尽,发边远地区充军;强奸犯奸妇女未遂,致使其羞愧自尽,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如果妇女犯奸后改过自新,确有证据,以良人妇女论。^[6]是否“贞洁”,决定妇女获得法律保护和救济的资格和权限是否完整。

四、结语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了解林黛玉所说的“风刀霜剑”指的是什么了。它既是不平等的家庭伦理,也是极端压抑女性权利的群体无意识和社会规范,更是不良的法律。家庭等级伦理的压迫、社会中普遍的怀疑和污蔑气氛、法律的不良,共同编织了吞噬年轻女性生命的巨网。在家庭中,她们需要面对容隐传统、等级伦理、受限的诉讼权利;在社会中,贞节成为跨越性别、阶级和种族,发动家族、邻居、基层政府工作者和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等全部社会群体的社会运动,为了维护贞节,妇女要么自杀,要么被狐疑的丈夫杀死,要么被奸夫杀死;在法律上,威逼人致死、亲属相奸、诬告、干名犯义等法律详尽规定了妇女自杀的情形和处理,而证据查明的困难、法律打击范围的过度扩张、法律内在的混乱、对先前身份的区分,使得自杀成为妇女证明自身清白的唯一的“最好的”选择。总之,按照现代的观点,在法律面前,她们并不表现为人(appeared as persons before the law),而是锋利的刀剑之下待宰的羔羊。虽然家庭、社会同样可以带来不利后果,但如果没有法律制度这一最有效、最直观、最简便的手段将权利与义务固定,家庭和社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恐怕也不会那样大。戴震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者,其谁怜之?”^[7]他的话是不完整的。我们可以补充一句,“人死于刀,犹有怜之者。死于法者,其谁怜之?”法之立也,可不慎乎?

[1] 军机处档折,《奏报审拟铜山县民王贵等京控案情形》,道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档号:070555。

[2] [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三十四,清光绪刊本,73b-74a。

[3] 同上注50b-51a。

[4] 同上注71b。

[5] 同上注53a。

[6] 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468页。

[7] [清]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5页。